

凭窗读史

百年守望:

张伯驹与故宫国宝

今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。近日,“百年守护——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”大展正式对公众开放,从百万藏品中精选出200件(套)国宝珍品,展现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历程。

故宫百年的漫长岁月里,景仁宫景仁榜上庄重地镌刻着700多位捐献者的姓名。这些收藏家心怀大爱,累计向故宫博物院无私捐献了3万余件文物。其中,大收藏家张伯驹显得格外耀眼,“百年守护”展览首章便重磅呈现了东晋王珣《伯远帖》、唐代李白《上阳台帖》、北宋黄庭坚《诸上座帖》等国宝级书画。而这三件珍贵文物得以永久陈列故宫,均与张伯驹先生有着深厚且曲折的渊源。

王珣《伯远帖》:东晋风流宛然在眼

王珣是东晋名门王导之孙,书圣王羲之族侄,亦是书法名家。著名的《伯远帖》是王珣写给亲友的一封信,信中写道:

顿首顿首,伯远胜业情期,群从之宝。自以臧惠,志在优游。始获此出,意不克申。分别如昨,永为畴昔。远隔岭峤,不相瞻临。

信大意是说,伯远你卓越的成就和情谊,是家族中的瑰宝。我身体羸弱多病,志向在于悠游自在。分别就像昨天,但都已成为过去。我们如今却远隔千山万水,无法相见。

魏晋时期的高士多崇尚清静避世、寄情山水,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,亦能充分感受到王珣的淡泊与洒脱。《伯远帖》笔墨俊丽秀雅,结体瘦硬开张,笔法飘逸疏朗,完美展现出晋人“尚韵”的审美追求,毫无刻意雕琢之痕,恰似王珣不拘礼教、追求个性自由的文化本真。明代书家董其昌在《画禅室随笔》中这么评价《伯远帖》:“潇洒古淡,东晋风流,宛然在眼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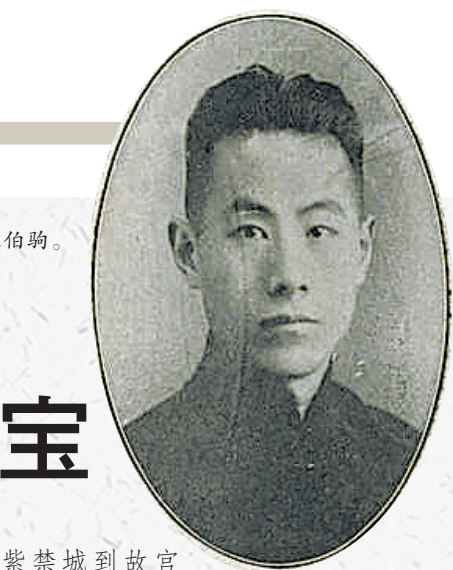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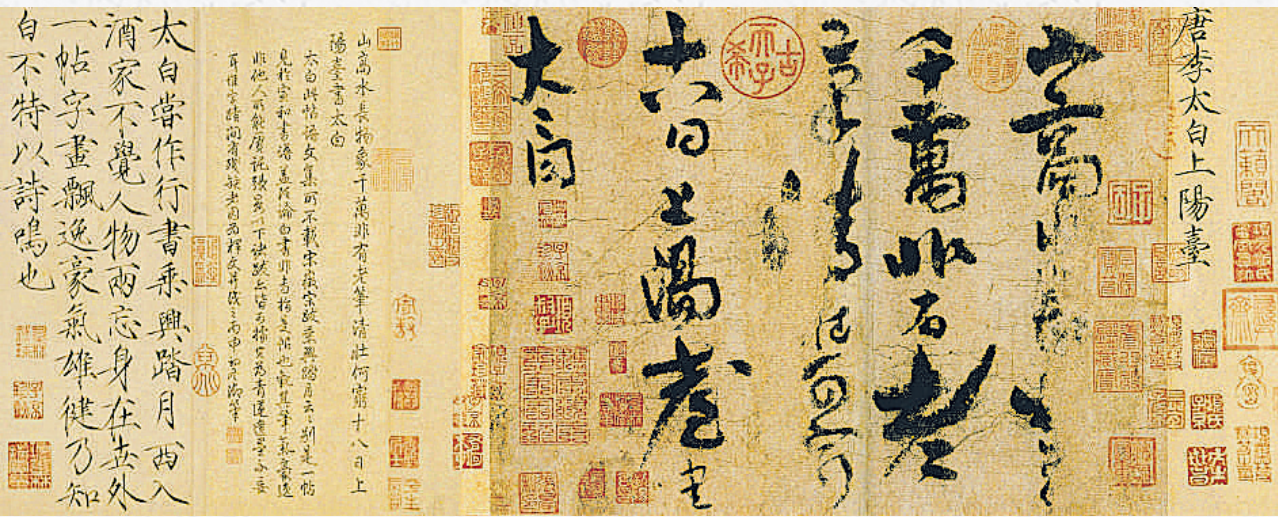
《伯远帖》北宋时曾入宋徽宗宣和内府,收录于《宣和书谱》,后流落民间,入明为董其昌所有,清代则经大收藏家安岐珍藏。乾隆十一年(1746年),《伯远帖》进入清宫,深得乾隆皇帝喜爱,特意将其与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、王献之的《中秋帖》一同珍藏于养心殿的“三希堂”,并称为“三希”。经历代专家考证,如今已确认《快雪时晴帖》和《中秋帖》均为后世摹本,而王珣《伯远帖》则为真迹。鉴定家启功也曾对“三希”做过精密考证,在其《论书绝句》一书中赋诗“王帖惟余伯远真,非摹是写最精神”,肯定王氏三帖中唯有《伯远帖》为真迹。作为王氏家族法书的唯一传世真迹,王珣《伯远帖》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文献与艺术价值。《伯远帖》问世于1600多年前,堪称中国书法史上的瑰宝。该帖所用纸墨精良,至今依然古色照人。值得一提的是,此帖与张伯驹先生收藏的西晋陆机《平复帖》,共同构成了现今仅存的两件晋代名人法书,是研究晋代书法风貌的核心实物资料。

张伯驹求购《上阳台帖》与《伯远帖》始末

天宝三年,公元744年,被唐玄宗“赐金还山”的诗仙李白,邀请诗圣杜甫和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,自洛阳一路顺黄河东游。当行至河南济源时,李白特意登上上阳台宫,去探望恩师司马承祯道长,却不料道长已然羽化升仙。面对道长留下的亲笔山水壁画,李白有感而发,挥笔写下《上阳台帖》,以寄托对恩师的思念之情:

山高水长,物象千万。非有老笔,清壮可穷。
——十八日,上阳台书,太白。

《上阳台帖》为李白自书四言诗,全



青年张伯驹。

文仅二十五字,此帖历经宋徽宗与诸多历代鉴藏家递藏。卷首有宋徽宗瘦金体亲题“唐李太白上阳台”,乾隆皇帝亦在引首亲笔写下“青莲逸翰”四字,足见对其珍爱有加。《上阳台帖》卷后,还附有宋徽宗、元张晏、欧阳玄、王庆庆、危素、驹鲁以及乾隆皇帝等人的跋文,自北宋以来流传有序,是现存唯一的李白法书墨宝,启功先生称此帖“字迹磊落”,梳理“它的流传经过,是历历可考的”,因此赞誉其为“肉迹”,称见其字犹如见到李白本人。

王珣的《伯远帖》、王献之的《中秋帖》以及李白的《上阳台帖》,都曾珍藏于张伯驹先生的丛碧山房,三件国宝得以入藏故宫,也都与张伯驹先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这段渊源,还要从民国时期的一位收藏家郭葆昌说起。

郭葆昌早年在北京一家古玩店当学徒,他为人机灵干练,机缘巧合之下进入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麾下当差,逐渐赢得了袁世凯的信任。在袁世凯意图复辟称帝时,郭葆昌被其任命为“陶务总监督”,受命前往景德镇烧制“洪宪”瓷。郭葆昌尽心尽力,烧制出了三四万件“洪宪御瓷”。这些“御瓷”无论从造型、图案还是从工艺细节等方面来看,都毫不逊色于历代皇家“官窑”。然而,复辟闹剧很快就草草收场,所以“洪宪御瓷”中的大量精品,并未按原计划进入袁世凯的“皇室”,而是落入郭葆昌囊中,成了他的私人藏品。也正因此如此,让他借机发了一笔横财。

1937年春天,张伯驹在郭葆昌家中见到了《中秋帖》、《伯远帖》和《上阳台帖》,还有明唐伯虎的《孟蜀宫妓图》、清王时敏《山水图》和蒋廷锡《御园瑞瑞图》六件珍贵书画。张伯驹在《三希堂晋帖》一文中,有如下记述:

郭(葆昌)有伊秉绶《三圣草堂颂》,颇以自豪。但其旨在图利,非为收藏。当时余恐两帖或流落海外,不复有延津剑合之望。

张伯驹害怕国宝外流,有意收藏,因此就请琉璃厂惠古斋的老板柳春农居间,郭葆昌开价二十万大洋,张伯驹先支付六万大洋作定金,将画取走,约定一年内存清余款。

1937年夏,七七事变爆发,日本全面侵华,北平遭到金融封锁,张伯驹被困于此,上海盐业银行的汇款无法汇来。加之此前他购买西晋陆机的《平复帖》花费巨款,无奈之下,第二年张伯驹只好将《中秋帖》和《伯远帖》退还给郭葆昌。如此一来,余下的李白《上阳台帖》、唐伯虎《孟蜀宫妓图》、王时敏《山水图》和蒋廷锡《御园瑞瑞图》四件画作,则抵付已支付的六万大洋定金,归张伯驹所有。

抗战胜利后,张伯驹先生对这两件墨宝依旧念念不忘,彼时,郭葆昌已于1942年去世,其子郭昭俊继承了收藏。张伯驹托人向郭昭俊求购二帖,郭昭俊开价高达1000两黄金,虽经多次协商,郭昭俊坚持不降价,张伯驹也只能望帖兴叹。

1949年,郭昭俊把《中秋帖》《伯远

帖》带到台湾,后因急需用钱,便将两件墨宝抵押到香港的一家英国银行。张伯驹得知后,赶忙给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写信,建议由国家出面收回。鉴于款项数额巨大,最终得到周恩来总理的特批。1951年,国家文物局终以35万港元(折合27万人民币)购回这两件墨宝,并划拨给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。张伯驹得知“二希”回归的消息后激动不已,还专门给国家文物局写信,请求能再看一眼这失而复得的国宝。当他再次于故宫见到这两位“老友”时,不禁感慨万千,同时,新政府全力保护国家珍贵文化遗产的态度,也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。1953年,张伯驹先生出于对毛主席的敬爱,通过中央统战部将李白的《上阳台帖》慷慨相赠,毛主席亦回赠谢酬,并于1958年把《上阳台帖》转赠给故宫博物院珍藏。

“予所收蓄,不必终予身”

《诸上座帖》则是北宋大书法家黄庭坚的经典之作。黄庭坚身为“宋四家”之一以及“苏门四学士”成员,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。这幅作品是他为友人李任道精心录写而成,内容源自五代金陵僧人法眼宗文益禅师的《语录》,不仅展现出其精湛的书法艺术,还承载着特定的文人交游与禅宗思想传播的意义。《诸上座帖》师法怀素狂草体,曾一度被命名为《拳怀素书》,该帖成书于黄庭坚晚年书艺最为成熟时期,笔意纵横,气势苍茫雄浑,字法奇宕高古,尽显黄庭坚悬腕操锋运笔的高超书艺,被誉为黄庭坚传世法书的代表之作。《诸上座帖》传承有序,最初藏于南宋高宗内府,后归权相贾似道;明代辗转递藏于李应祿、华夏、周亮工处,清初为孙承泽所珍藏,乾隆时期收入内府。

1924年,溥仪被逐出清官时,将《诸上座帖》偷盗出宫。在天津,溥仪为维持奢华生活,让近身大臣陈宝琛办理故宫旧藏书画抵押事宜,陈便取出四十幅古代珍贵书画,委托外甥刘可超拿去兜售。1927年,刘可超拿着五代关仝《秋山平远图》、南宋公麟《五马图》、宋黄庭坚《诸上座帖》和宋米友仁《姚山秋霁图》四件古画,到天津盐业银行申请抵押贷款五万元。后来,刘可超无力归还全部款项,盐业银行便以押品作价抵账,张伯驹遂以一万五千元的价格将米友仁《姚山秋霁图》和黄庭坚《诸上座帖》收为私有。张伯驹先生一生钟情于文物收藏,在民国那个动荡不安,国宝屡遭盗劫的年代,他凭借深厚的学识、雄厚的财力以及满腔热忱,费尽心血守护文物国宝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,他心怀大义,在新中国成立后陆续捐献了诸多书画珍品,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故宫博物院的馆藏,更为中华民族留存下璀璨的文化瑰宝,也切实践行了他“予所收蓄,不必终予身,为予有,但使永存吾土,世传有绪”的收藏初心。

荣宏君

情怀与力量

丰子恺的抗战漫画

全面抗战开始后,丰子恺拖儿带女、扶老携幼、肩扛手提,从浙江出发,途经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广西、贵州、四川、河南,于1946年9月抵达上海。逃难九年,辗转千里,虽然丰子恺没有投笔从戎,与日寇决战沙场,但他创作了大量抗战漫画,为抗战贡献出自己的力量。

以笔从戎 记录暴行

丰子恺很早就关注日寇侵略中国的暴行了。桐乡的石门遭到轰炸时,他正在缘缘堂里阅读蒋经忍的著作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》,进而了解到日本对中国一贯的觊觎。没过多久,他从亲戚那里得知日寇轰炸嘉兴的惨状:有位母亲坐在长凳上给孩子喂奶,一颗炸弹投下,弹片削去了她的头颅,鲜血喷出,孩子还在母亲怀里吃奶,玩具掉到长凳上……那场面着实让人惊恐!丰子恺据此创作了《轰炸——嘉兴所见》。后来在逃难路上,丰子恺又听闻广州大轰炸的惨状,创作了数幅“轰炸”主题的漫画:敌机疯狂轰炸,母亲背着孩子逃命,突然,一颗炸弹投下,弹片削去了孩子的头颅,母亲浑然不觉,依旧向前狂奔……另一幅漫画上,一人不幸倒在血泊里,还有两人正狂奔逃命,他们身后是不断落下的炸弹。除了直接描绘轰炸的场景,丰子恺还画过一幅《小主人的腿》,一只狗街着小主人的一条腿,鲜血淋漓……

这组“轰炸”主题的漫画,深刻地揭露了日寇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,许多读者看后,恨不得马上冲到前线,与日寇决一死战。这就是漫画的力量。对漫画在抗战中的力量,丰子恺有自己的认识——

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,因为它的宣传力顶锐利。锐利的原因有二:第一,看漫画一望而知,不花长时间。抗战的文章,无论怎样短小精悍,一字一句地读下去,至少也要花几分钟。看漫画只费几秒钟,就能了解画的意味,就能明白画的主旨。在繁忙的非常时期,这种宣传方法是最有效的。

第二,漫画是一种世界语,任何国人都看得懂。漫画是一种不须学习的文字,文盲也看得懂,故其宣传力最广。虽然多数漫画是靠文字相互说明的,但少用文字或者完全不用文字,而能使大众一目了然的,是漫画中之上乘。

综上所述,读漫画不费时间、容易理解,故在目前是最有力、最普遍的宣传工具,其效力远在文字之上。这可说是笔杆抗战的先锋。古语云:“百闻不如一见。”现在我可以“说”百篇文章不及一幅漫画”。

全民抗战 妇孺皆兵

面对日寇的侵略,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,丰子恺用画笔勾勒了“全民抗战”时代背景下,那些“舍小家,为大家”的壮举。妻子在送丈夫出征时,细心地给丈夫整理军装,一句“不许戎衣有泪痕”,让豪迈、坚强喷薄而出。丈夫牵马出征,与抱着孩子的妻子告别,妻子告诉丈夫:“有身当殉国,君为塞下土,妾作山头石。”丰子恺便为这幅漫画题写了“征妇语征夫,有身当殉国,君为塞下土,妾作山头石”。还有一幅同题材的漫画,说话的人变成了丈夫:“死生不可知,欲慰泉下魂,但视襁中儿。”丰子恺便为这幅漫画题写了“征夫语征妇,死生不可知,欲慰泉下魂,但视襁中儿”。另有一幅表现母亲送儿子上战场的《君到前线去》,老母亲拄着拐杖,语重心长地说道:“君到前线去,寄语我儿郎,若非打败仗,不得还家乡!”这句话无比感人,今日读来,依旧心潮澎湃。

丰子恺不仅关注“成年人的抗战”,也关注“少年儿童的抗战”。“战时学生生活”主题漫画中的那幅《有力出力》,一人正写标语,在他旁边有三个小学生,一个打扇,一个递茶,一个伸纸。还有一幅漫画,是五个学生在“救国捐”前捐款,画题为“今朝不吃糖,将钱去救国,虽只一分钱,多少有补益”,洋溢着浓浓的爱国情。

以小见大 信念坚定

丰子恺的抗战漫画既反映了战争给国人带来的苦难,也传递出国



战场之春



卅四年八月十日之夜



征妇语征夫(征妇语征夫,有身当殉国,君为塞下土,妾作山头石)

人“抗战必胜”的信念。信念慢慢滋长,渐渐扎根,就像丰子恺的漫画,见微知著,以小见大。

在山洞里,有个人正如饥似渴地读书,全然忘却了洞外刺耳的警报——这幅《警报中》,使读书的意义得到升华,堪为“读书不忘救国,救国不忘读书”。春日,丰子恺和两个女儿在郊外的路边看到一棵大树,虽然遍体鳞伤,只剩几个小树杈,仍有新枝新叶长出,《劫后重生》因此诞生;还有一幅漫画,同样是一棵大树,被砍伐后生机勃勃,丰子恺为这幅漫画题写了“大树被砍伐,生机并不息,春来怒抽条,气象何蓬勃”。两幅漫画预示着中国一定会浴火重生。《生机》是丰子恺的得意之作,他说:“记得有一次,我在院子里散步,偶然看见石灰脱落了的墙壁上的砖头缝里生出一枝小小的植物来,青青的茎弯弯地伸在空中,约有三四寸长,茎的头顶着两瓣绿叶,鲜嫩袅娜,怪可爱的。我吃了一惊,同时如获至宝。”用文字难以言明彼时的心绪,干脆把它画下来。

1939年初,丰子恺在离开桂林师范学校前,送给同事不少漫画,画题都是元人吕思诚《戏题》中的“严霜烈日皆经过,次第春风到草庐”,他说:“同事中多颠沛流离而来者,得此画可资振作。”

1938年创作的《散沙与沙袋》,也是“以小见大”之作。画中,大人带着孩子正在用布袋装散沙,他们身后堆着不少沙袋。漫画左上方,丰子恺题写了“散沙团结,可以御敌”八个字,鼓励国人团结起来。是次,他用文字作了补充说明——

这无数的沙粒到哪里去了呢?东西南北,各自分散,没有法子召集

了。因为他们的团结力非常薄弱,一阵风可使他们立刻解散,他们的分子非常细小。一经解散,就不可收拾。

倘用袋装沙,沙就能显示出伟大的能力来。君不见抗战以来,处处地方堆着沙袋,以防敌人的炮火炸弹的肆虐么?敌人的枪支和炮弹一碰着沙袋,就失却火力,敌人的炸弹片遇着沙袋,也就不能伤人,沙的抵抗力比铁还大,比石更强。这真是意想不到的功用。

原来沙这种东西,没有约束时不可收拾,一经约束,就有伟大的能力。中国四万万,曾经被称为“一盘散沙”。抗战“好比一只沙袋”,现在已经把他们约束了。

在坚定国人“抗战必胜”信念的同时,丰子恺意图通过漫画传递乐观、积极的情绪。比如《战苦军犹乐》,描绘了两名战士趁战斗的间隙,在掩体里吹笛子—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、空间,延续自己的爱好,既可寄托情思,又能振奋斗志。还有《马革裹尸真壮士,阳关莫作断肠声》,三名战士在树下喝茶吹箫,箫音或许悲壮,但画面传递的情绪是明快的,能让人松口气。《炮弹作花瓶,万世乐太平》《愿作安琪儿,空中收炸弹》《战场之花》等,弱化了战时的激烈表达,多着眼于美好的事物,以表达对和平的期盼。

岁岁年年 渴望胜利

1939年9月11日,正在浙江大学师范学院任教的丰子恺为了响应学校“纪念九一八事变八周年”的活动,抱病画了四幅幻灯片漫画。第一幅为《骑虎》,写一猴子伏在虎背上,虎正咆哮,猴正狼狽;第二幅为《国际饭店》,写一日本鬼食毕,坐在餐桌旁,餐桌上的一摞空盘写有“东三省”“华北”“华东”“华中”“华南”等字样,一堂信手持菜单,向此饕餮者索钞;第三幅为《军民合作》,写两民众抱着一个军人的左右脚,将其抬高,军人伸手向墙头采一大瓜,瓜上写着“最后胜利”四个字;第四幅是《消毒》,写一男孩用毛刷刷地球,一女孩提壶冲洗,壶上写着“除暴剂”三个字。这组漫画别出心裁,立意深刻,是丰子恺抗战漫画的代表作。据说,丰子恺在抗战时期不愿坐沙发,皆因沙发“不抵抗”,这样的情怀,今人是不可想象的。

尤其让人感动的是,丰子恺对胜利的渴望,甚至寄托在日常生活中,有时碰到一件好事抑或一件烦心事,他马上就联想到这可能是抗战即将胜利的信号。丰子恺在桂林师范学院任教时,暂居于洋塘岭40号;其时,他的两个女儿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,因长期在家自学,引起驻扎洋塘岭的随军家属的注意,有随军家属上门为一个连长提亲,遭到丰子恺全家的反对。后来,丰子恺只好将两个女儿送到永福县,以避免纠缠。这本来是一件烦心事,丰子恺却在日记中写道:“年终逢喜,乃来岁之好兆。明年抗战必胜,吾家可返江南故乡矣。”丰富的联想,可视作另类的“思乡情切”。1939年2月18日是除夕,丰子恺又在日记中写道:“但望明年此日,吾国吾家均有更大胜利。”一年又一年,他盼望着抗战的胜利。

1945年8月10日晚,日本宣布投降,丰子恺画了一幅《卅四年八月十日之夜》。画中,一位军人重返自己的小家,高高抱起儿子,与妻子、女儿一同庆祝抗战胜利。同题的漫画有多幅,充分表明了丰子恺的喜悦心情。

1945年12月,丰子恺的抗战漫画集《劫余漫画》由万叶书店出版,书中收录了六十幅漫画,其中的三十幅是亲友在缘缘堂被毁前一日抢救出来的,另外三十幅是逃难途中所作,“此画之终得问世,与我身之终得生还,皆劫中奇迹,虎口余生也”。

丰子恺的抗战漫画是抗战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,凭借其独特的魅力与巨大的能量,激励千千万万中国人加入抗战的行列。这是丰子恺爱国情怀的流露,也是“子恺漫画”力量的传递与延续。

钟桂松